

曾传芳 著

Benedetto Croce has noted that "only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the present can move one to investigate past fact." An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life prompts us to examine history, or to awake history, to reflect and gain an insight into 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a time-honored artistic practice which develops with the progress of time, uses history as its subject matter. It serves as an umbilical cord connect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o narrate history does not merely purport to represent the past, but also to address the present; hence, it is an act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y.

Narrativ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 Study of William Styron's Historical Fiction

叙事策略与历史重构

威廉·斯泰伦历史小说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曾传芳 著

Benedetto Croce has noted that "only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the present can move one to investigate past fact." An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life prompts us to examine history, or to awake history, to reflect and gain an insight into 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a time-honored artistic practice which develops with the progress of time, uses history as its subject matter. It serves as an umbilical cord connect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o narrate history does not merely purport to represent the past, but also to address the present; hence, it is an act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y.

Narrativ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 Study of William Styron's Historical Fiction

叙事策略与历史重构

威廉·斯泰伦历史小说阅读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新路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策略与历史重构:威廉·斯泰伦历史小说研究 /
曾传芳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14-4293-7

I. 叙… II. 曾… III. 斯泰伦, v. (1925~2006) — 历
史小说—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978 号

书名 叙事策略与历史重构 ——威廉·斯泰伦历史小说研究

著 者	曾传芳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93-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9.37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cknowledgements

This book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ose kind persons hereafter mentioned with gratitude, although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shortcomings rests entirely with me.

My deepest gratitude goes first and foremost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Yu Jianhua, for his generosity of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to this research project over the time of my study and research in the PhD program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 am especially grateful to him for carefully and constructively reading the complete draft. My heartfelt thanks are also extended to him for writing the “Preface” for this book. And I have gained tremendously from his remarkable expertise, intellectual ingenuity and infectious enthusiasm, which will be profoundly significant to my future research.

I would also like to acknowledge my indebtedness to Professor Li Weiping, Professor Shi Zhikang, and Professor Zhang Dingquan, who have boosted my intellectual growth through their inspiring lectures over the years when I was studying for my PhD degre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 have many supportive friends to thank for their willing assistance and unfailing encouragement during my three-year study and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book. Many of them have sent me some hard-to-find materials

from afar. My esteemed colleagues and friends, Ms Maureen Eddyned and Ms Bernadette Hargan, have patiently read part of the manuscript. I also owe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classmates who gave me their help and time in listening to me and helping me work out my problems during the difficult course of writing this book.

Last but not least, my thanks would go to my family for their patience and tolerance towards my long-time neglect of family obligations. And I particularly feel indebted to my daughter Yao Qinkun, whose excellent performance both at home and school is a great support to me, hence I can concentrate on my academic research.

在小说中重写、重读历史

（代序）

虞建华

曾传芳曾在我的名下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寒窗，在历史小说研究领域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她关于斯泰伦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结合了历史与文学的讨论，让读者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取今天的认识，也将文本细读与理论探索糅合一体，笔法老练，富有见解，赢得了很多好评。《叙事策略与历史重构——斯泰伦历史小说研究》是曾传芳博士多年学习、思考和研究的结晶。斯泰伦的作品只是个案，通过个案的分析曾传芳关注的是一个更宽泛、更重大的命题，即作家如何在小说中重写“既定”历史，从而颠覆主流话语，引导读者从新的视角对已写就、已接受历史进行反思和再认识。这本书能够出版，与更多的学者进行交流，实在是件好事情。

作为曾传芳研读对象的斯泰伦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都发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美国知识界对美国近代历史进行批判性总结和评定的时期。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福特执政期的回忆》（1992）中谈到这一时期美国的特征时说：“一个总统被枪杀，一场战争被打败，我们被看成邪恶的帝国，我们得天独厚的国家地位不复存在。庆祝游行的气球泄了气，我们仍然跌跌撞撞前行，如同 1865 年，步履蹒跚，像被赶

出了伊甸园，孤独地朝前走。”引文中提到的 1865 年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当时，美国人打完了一场消耗惨重的持久的内战，必须对民族、国家、政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认识。一百年后当斯泰伦发表这两部历史小说的时候，美国人似乎又一次走到了给自己重新定义的历史当口。厄普代克提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 1963 年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二是从 1965 到 1975 年的 10 年越南战争的失败。但是，促使美国人反思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状、所接纳的文化价值和所追随的信仰体系的，远不止上述两大因素。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多事之秋，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1962）、马丁·路德·金遇刺（1968）、参选总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1968）等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 60 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垮掉派反文化运动。踏进 70 年代之后，“水门事件”（1974）、学生潮，以及冷战中加剧的核军备竞赛，使新时代被“文明危机”的阴云所笼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著名作家威廉·斯泰伦推出了《纳特·特纳的自白》（1967）和《苏菲的选择》（1979）两部历史小说，前者反思美国的蓄奴制，对发生于 1831 年的一场惨烈的奴隶暴动进行了不同于历史记载的重新表述；后者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集中营中受害者的故事。斯泰伦以小说的形式，将曾发生于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令人震惊的事件，再一次铺陈在读者面前，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形成呼应，让历史与当代进行对话，使读者不仅从今天的新视角重新考量过去的幸，而且希望人们带着历史的教训来审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批评家弗雷德里克·霍夫曼指出，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使用”了某一时期的史料，也不在于它表达了某一主题思想，更不局限于它为政治、思想史作诠释，具有文献的功能，“而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最高概括，是通向认识某

一时代重大事件的真正径途。”历史小说的优势在于它能使人类的经历或记忆复活，得到戏剧化的再现，帮助读者看到引向某种结果（往往是不幸结果）背后的主导观念，从中获得警示或教益。

我们所言及的历史，不可能是真实过去的总和，而是文本化的记载。真实的过去浩如烟海，文本记录的只是沧海一粟。而且，留存给我们的这一丁点儿记载，也是经过了史学家们人为选择、裁剪和拼合的。因此，系统性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偶然性，客观性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主观性。所以我们说历史是建构的：在对历史语境的重新审视、对历史事件重新组合、对历史编码重新阐释、对历史人物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历史撰写者重构，或曰“创造”了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历史叙述者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是带着今天的关注、今天的视角、今天的困惑来“翻新”历史的，其动机往往超越历史本身，与“当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小说作家也一样，在用艺术手法重现过去的“真实”故事的时候，给历史涂上了现代的油彩。

同历史学家一样，历史小说家斯泰伦也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超越当前。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进行的故事化的诠释，必定是一种服务于现今的重新书写。正因如此，即使文学作品涉及的是过去的题材，其中也必然倾注着一种现代精神。历史小说家的努力其实是从现在的兴趣点和立足点出发，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重构。重构不是编造，也不是歪曲历史，因为不存在可以进行比对的“正确”的历史坐标。著名作家索尔·贝娄说：“每一个小说家都是历史学家，是他那个时代编年史的编写者。”他的意思是，作家参与了历史建构；作为文化产品，他

的作品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作家对进入作品的素材进行了筛选、过滤、提炼和重组，文学作品中的任何内容——故事、人物、主题、背景，都已经不再是现实本身，而是一种艺术创造，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斯泰伦是带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强烈关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重读、重写过去的大事件的。而曾传芳博士今天对斯泰伦的研究，又是从21世纪初的视角对作家重新阐释的历史进行的再阐释，让斯泰伦的历史小说获得今天的签证，成为今天的镜子，引导读者对导致恐怖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进行再认识，服务于我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树立对文化和种族平等、价值多元的信念。

近些年我们读到的文学研究，常常倒向两个极端倾向中的一边：要么过分专注于文本，对作品中的对话、结构、意象、语码、修辞进行语言学的精细解析，把作品看成一个封闭的自足世界；要么挂靠某一哲学观点，联想发挥，天马行空。其实，不管有多少种途径和方法——不管是注重历史，还是注重心理，不管是强调结构，还是强调文本，文学的讨论总是牵连历史、社会、文化，也总是与种族、阶级、性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T·S·艾略特曾说：“没有任何诗人和艺术家能单独构成意义。他的重要性、他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他与过去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中。”在曾传芳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再现与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联，看到了理论框架中的细致的文本分析，看到了文学研究真正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她的研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希望读者也都会喜欢并从中获得启迪。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2008年10月20日

中文摘要

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故而，过去的事情一旦和对现在生活的兴趣相结合，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了。”这种对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历史。历史题材创作作为一种历史悠久而又随时代成长的艺术实践，从已逝去的历史中寻求叙述资源，同时又是连接当今时代的脐带。所有对历史进行叙述的行为，其动机并非仅仅是再现历史，而是为了针对现实说话，是为了重构历史；人的应然存在不能凭空建立，而要从对人的已然存在的追问中获取。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凭借文学叙事的方式进行历史言说的兴趣无一不是来自于解决现实危机的需要。历史题材创作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侧面映照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解读历史题材小说，在重温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历史的时候，同时也打开了一轴用“进行时”书写的当代画卷。

所谓“历史”，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即人类出现以来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历史的回忆和思考，即人类是如何将经历和创造的全部过去加以保存和诠释的。换句话说，历史包括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识。历史作为人类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的客观存在，后人无法亲历，我们能企及的无一例外都是文本化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所谈论的历史其实是指书写的历史。随着语言哲学和现代思潮的发展，我们认识到，书写的历史不能原原本本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历史的再现功能受到质疑，“历史若文学”的思想盛行。

然而，文学又不同于历史。历史撰述的目的在于呈现一系列前后相继、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历史撰写往往把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人当作干巴巴的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来论及。因此，历史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而趋于忽略人类自身的内部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外部的历史事件总是处于第一位的，而历史人物本身则退居二位。相反，文学是从最根本的源头去展现人的隐秘的生活，深入到人物内心去呈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注重个人生活描述，关注个人感觉的真实，而心理真实往往优于外部真实。再者，历史不仅仅包含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它还包含参与这些活动的个人。个人生活反映和体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个人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写照。历史小说通常通过重塑历史人物、重新审视历史事件来重构该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或该事件所发生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对历史的重构更能够真实地再现过去，或者说，小说是重构历史的另一手段。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激化，黑人民权运动和全民反战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在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的鼓励和影响下，美国出现了以白人学生为主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新左派运动。与此同时，美国妇女行动起来，对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中的性别压迫、性别歧视现象展开猛烈的抨击。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社会文化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发生了重大变化。风起云涌的各种群众运动和文化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文化反叛运动相呼应，一些小说家开始尝试对文学传统的反叛；在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方面进行革新实验。另一批作家不仅关注现实，投身政治活动，而且还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强烈道德和社会意识的优秀作品。威

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 1925-2006)便是这批作家中的一员。

威廉·斯泰伦深受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熏陶,具有南方作家特有的道德和历史意识。在他的作品中,人类历史、人性的善恶等问题都得到了人文主义的观照。斯泰伦虽然是借鉴了现代派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但他也受到当时盛行于美国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界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采用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修正主义史学观和撰史观,并结合时代的需要和对现实社会的兴趣,回顾历史,研究过去的事实。他的历史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重新审视发生于1831年的一场惨烈的奴隶暴动事件,重塑了黑人奴隶领袖特纳的形象,从而重构了19世纪中叶美国的奴隶制社会的生活画面。《苏菲的选择》则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事件——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在这两部历史小说中,斯泰伦主要使用了“追忆历史”“审视历史”和“寻求救赎”3种叙事策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新的诠释。

近三百年的奴隶制度、种族问题已经沉淀为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是黑人的痛,也是白人的痛。斯泰伦一生怀着对黑人命运的深深关注,他的5部主要作品都探讨或涉及了种族问题。他对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并以实际行动为黑人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权利的斗争呐喊助威。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黑人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斯泰伦深表同情,并指出激烈的种族矛盾是由于长期以来白人对黑人的忽视和蔑视造成的。黑人被视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道德判断标准的私有财产的观念不仅在内战前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于许多美国白人头脑里;白人拒绝把黑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去了解,避免同黑人有直接的交往。对此斯泰伦持批判态度。他还反对夸大黑人对奴隶制度的反抗,将黑人当作无时无地不试图用暴力手段发动暴乱的狂热分子。斯泰伦认为这两

种态度都严重地曲解了黑人的真实形象。面对现实的种族危机、社会的动荡，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斯泰伦充分利用文学手段来反思历史，谋求解决当前问题的良策；历史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就是作家身体力行的明证。

小说讲述了 19 世纪 30 年代黑奴起义领袖纳特·特纳的故事，出版后虽然立即受到了白人评论家的普遍赞扬，但却遭到黑人知识界的一致批评。他们指责斯泰伦在小说中有意篡改历史、歪曲奴隶起义领袖的形象，把深受黑人群众敬爱的纳特·特纳描绘成“笨拙的、优柔寡断的、神经失常的闹人”。

然而，从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入手，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发现斯泰伦在追忆过去时，大胆地质疑了由白人执笔撰写的有关纳特·特纳事迹的历史，颠覆了纳特在白人心中滥杀无辜的宗教狂热分子形象；与此同时，斯泰伦又修正了特纳作为黑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化了的英雄形象。斯泰伦笔下的特纳首先被还原成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特纳又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黑人，一个奴隶。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唯有黑人是带着脚链与手铐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属于“非自愿移民”。从一踏入这个异文化世界里，拥有非洲根的黑人就有了他们寻找自我、建构身份和追求自由的漫漫征程。有关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理论揭示斯泰伦所塑造的特纳历经建立自主意识、政治身份和叙事身份 3 个阶段的身份认同；斯泰伦还通过特纳探讨了黑人奴隶内心深处所负载的沉重的“双重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并在特纳身上表现出来的分裂人格。审视历史，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纳特最终认识到，一方面黑人要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种族之间、个人之间不能互相对抗，甚至用暴力手段来剥夺他人的自由和生存的权利，而应该有博爱的精神，相互理解，彼此接纳，互相融合。通过这样的沉思，纳特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悟，他的灵

魂得到了救赎。作家赋予黑人以完整的个性、独立人格和身份，声讨了罪恶的奴隶制度，为白人对黑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可以说斯泰伦的这部作品是白人试图了解黑人，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的有意义的尝试。不难看出，斯泰伦的这部历史小说表现了作家在种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他赞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义，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力，主张黑人和白人之间达成互谅与和解。

斯泰伦的关注点不仅仅聚焦于与美国、美国南方直接相关的话题，他曾提出“南方作家现在要脱掉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的创作观。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之后，人性、理性、道德被放逐，人类社会处于持续的混乱之中。斯泰伦坚持文学艺术的本职是反映和探讨人类的生存状况，包括社会的混乱不堪、人的失败和绝望，以及人性的堕落。

在《苏菲的选择》中，他选择纳粹“大屠杀”为创作题材来探索人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以苏菲悲惨的命运为轴心，揭露纳粹令人发指的罪行，使读者不得不对人类历史中粗暴践踏人性的罪行、善与恶的较量等问题进行沉重的反思；另一条线以叙述者斯汀戈的成长为基点，将二战后美国社会与纳粹德国的“屠犹”罪行并置，不仅谴责和声讨了纳粹分子的惨无人道，更重要的是作家探讨了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无法破解之迷，即生活于地球的人类本该是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的一个大家庭，但现在的人类却无时不生活在互相迫害和残杀之中。包括阿多诺在内的不少哲学家、历史学家、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大屠杀事件太野蛮、太残忍，语言无法言说，唯有沉默才能告慰千千万万的受害者。斯泰伦却逆流而动，塑造虚构人物苏菲来接近、了解已成为历史的奥斯维辛，从而重构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无法言说的历

史，并以此来探讨人性之恶。

斯泰伦深信，大屠杀是犹太人的问题，但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大屠杀发生在崇尚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它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认为大屠杀是反犹主义的结果，是极端的社会现象，会曲解导致大屠杀的原因，从而使我们不能全面理解大屠杀给人类带来的教训。斯泰伦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讲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波兰女子——苏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随后来到美国的生活经历来追忆、反观和重新解读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事件。利用相关的创伤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给人类心灵造成的创伤永劫难复。细读文本，我们又看到作家赋予受害者双重身份：她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纳粹的同谋；而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分子身上似乎表现出人性一面。作家对善与恶二元对立并存关系的探讨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

首先，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语言与沉默》中沉痛地说道：“集中营的存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史坦纳所指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冷漠现象。反观大屠杀的历史，如果没有德国公众（尤其是科学家和教会）的冷漠，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屈从，没有俄罗斯人、美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大屠杀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苏菲虽然是受害者，但她却是反犹分子，对纳粹的暴行、犹太人的遭遇漠不关心。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的“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一个纳粹体制内平平常常的小小官僚，没有热情，亦无明显的爱憎；这样的公文机器，却将数百万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辜百姓送入死亡的绝地。她的言下之意是，这平庸的大恶可以在任何一地生发。斯泰伦深受阿伦特的影响，在作品中，他探讨了“恶之平庸”产生的诱因，那便是现代文明的缩影——官僚体系。官僚

体系意味着每一个行动者都从事着专门的工作，发挥着有限的功能；他只须服从上司的命令，不应对其命令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尽管大屠杀的实现需要诸多条件，然而，大屠杀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哲学家理查德·博恩斯坦曾严厉地批判西方现代文明所颂扬的、无往不胜的理性，他认为大屠杀是西方文明的文化遗产，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成为现实。斯泰伦在作品中则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逻辑是，确定目标，然后理性地实现目标，包括计算成本、按章办事和追求效率。因此，纳粹分子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官僚体系和社会的冷漠等因素共谋的结果。

斯泰伦将对大屠杀事件的追忆和审视与战后美国社会平行并置。两相对照，我们可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人情冷漠、官僚之风盛行、言必讲效率等。作家的用心是让读者意识到人性之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同的社会里、每个个人身上都潜伏着作恶的可能性。由此作家想唤起人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高度的警惕性，让人们通过审视别人的恶，意识到自己身上潜在的恶，只有意识了恶的存在，才有可能弃恶向善，人类自身才能得到救赎，“大屠杀”才不至于再发生，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纳特·特纳的自白》和《苏菲的选择》显示出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通过挥洒自如不事人工痕迹的现实与往事的交错叙述，作家建构了多重结构的文本；从容的叙述节奏使小说的情节推进自然而有序。《纳特·特纳的自白》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读者听到的是黑人特纳的声音，感受到的是特纳的内心世界。这一现象在美国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美国白人作家所塑造的黑人形象往往落入窠臼；麦尔维尔、福克纳等大师作品中的黑人充满人性、真实可信，但他们几乎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

的方式。斯泰伦大胆尝试，用第一人称，让读者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内心，去倾听他的心声，而黑人奴隶作为主人公追忆和审视自己的历史，叙述自己一生的得失，从而实现自己身份的建构、生命意义的追寻。《苏菲的选择》则与其他“大屠杀”题材小说不同，斯泰伦没有再现血腥的战争场面，也没渲染集中营里毒气室的恐怖阴森的气氛，而是将作品写成一部成长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来反思历史，探讨人性之恶，从而向人类提出警示。

本书采用历史-传记的研究方法，探讨斯泰伦两部历史小说的主题和创作意义；通过细读文本梳理了作家重构历史的叙事策略；使用史学理论说明反思历史、重构历史的积极意义，并应用相关的主体和身份建构理论、创伤理论和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人物的塑造。

本书的引言概述了作家斯泰伦进行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简要地分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3个阶段及其特点，以及集中研究他的两部历史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首先辨析了“历史”的两种内涵，然后论述了有关理论和学说对历史再现功能的质疑，并继而指出文学是重构人类历史的另一有效手段，历史小说尤其肩负这一重任。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斯泰伦在作品中重构历史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及其在重构历史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和撰史观。

第二章主要分析斯泰伦在《纳特·特纳的自白》中如何重构一部白人和黑人共同的历史。斯泰伦立足于现实，通过重述历史人物——黑人奴隶纳特·特纳——个人的历史来重新审视奴隶制，重构生活在奴隶制社会中白人与黑人的历史。该章首先分析作家如何颠覆传统历史文本中纳特·特纳的形象，然后使用叙事学、身份建构等理论，阐述作家如何将抽象化、模式化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并赋予他以独立的人格、完整